

# 社会学视野下转基因食品 社会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管开明

(武汉科技大学 文法与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81)

**摘要** 对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主要涉及三类人群,即专家学者、决策者和普通公众。由于各类人群所处的立场不同,转基因食品给他们带来的潜在或现实利益不同,再加之不同的人群在知识水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评价,从而进一步影响对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包括未来对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从系统论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各种不同因素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合理性与一致性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2)04-0036-03

转基因技术是当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在农业、工业、医药、环保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转基因食品作为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它的研究与发展既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也会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灾难,已经成为学术界乃至广大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特别是随着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通过国家农业部的安全认证,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否应该商业化、政府对转基因食品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等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论。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态度,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又表明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评价。哪些因素影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做出不同的评价呢?本文拟从系统论的角度,具体分析各种不同因素是如何影响各种不同主体对转基因食品做出不同评价的,并试图说明应如何才能形成对转基因食品合理而一致的评价。

## 一、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主体构成

所谓社会评价是指主体对客体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做出的评价,即某一社会中现实的人从某种社会角度出发去考察和评价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社会价值,判断该事物或现象对社会作用的性质和程度。<sup>[1](23-24)]</sup>社会是社会评价的主体,但作为社会评价主体的社会不是抽象的,而是从事社会评价的现实的人,以一定的社会身份按照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从某种社会角度出发去考察和评价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社会价值,即

判断它可能对社会发生的正面或负面作用及其大小。作为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主体由以下几个方面的人群构成<sup>①</sup>:

1.专家学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最能代表社会做出评价的,常常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即本质上被赋予为社会评价主体权利的代表者——社会权威。专家学者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是社会精神和知识财富的生产者,具有丰富而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是“社会理性”和“社会良知”的象征。<sup>[2](317-321)]</sup>作为知识领域的权威,他们对转基因食品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并往往会对转基因食品做出某些评价,这使他们成为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重要主体。作为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主体的专家学者,不仅包括直接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的生物技术专家和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开发者,还包括一部分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也包括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

2.决策者。转基因食品的决策者主要包括相关机关领导、政府和首脑人物。从理论上讲,这类权威机构和人物是转基因食品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决定者”和“监督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是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代表者和决定者,代表一定的社会做出评价。作为决策者,他的价值取向要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他与社会成员之间的需要和利益要相吻合。只有这样,决策者的评价才能体现社会评价的真实含义。<sup>[3](675-78)]</sup>

3.普通公众。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全人类的利

**作者简介** 管开明(1974—)男,博士,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讲师,湖北省重点文科基地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09BZX029;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编号:2010q012;湖北省重点文科基地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支持项目。

<sup>①</sup>关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主体,可参见毛新志、张利平的《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主体结构系统探析》一文,本文基本同意此文关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主体构成的观点,在此论述角度略有不同。

益,为了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最能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当然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公众。因此,从社会整体和发展上看,社会评价的真正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只有他们所作的评价,才是真正的社会评价。作为社会评价主体的普通公众,他必须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以社会价值规范、社会利益为标准对各种事物或现象的社会价值做出评估和断定,而非站在自己私人利益的立场上来进行评价。如果一位普通公众站在自己私人利益的立场上对转基因食品进行评价,那么他的评价就不是社会评价而只是个人评价。当然,作为普通公众的社会评价,总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评价组成的,但由于共处于同一社会之中,因而总与社会公共利益和需要发生一定程序的联系,从而体现出社会评价的性质。

## 二、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影响因素

### 1. 影响专家学者评价的因素。

(1) 专业知识背景。丰富而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使专家学者对转基因食品具有充分的发言权。但是,也正是这种专业知识背景使专家学者往往只能从自身所熟悉和了解的专业领域出发,对转基因食品做出某一方面的评价。作为直接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的生物技术专家,他们主要从纯粹的科学技术角度来评价转基因食品,侧重于转基因技术原理本身、安全性以及风险的评价。例如,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食品安全性分析的原则——“实质等同性”原则,就主要是由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制定的。依照该原则,如果转基因食品及其成分与已经在市场上销售的传统食品及成分相同,那么转基因食品就和传统食品一样安全。这一原则就是将转基因食品及成分与传统食品在分子生物学特征、表现特征、主要营养素、抗营养因子、毒性物质和过敏源等方面进行实质等同性比较,这实际上只是用一种化学成分的检测方法来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sup>[4] (106-108)</sup>社会学家则侧重于从社会的角度来评价转基因食品对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的影响,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于解决目前地球上的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口不断膨胀的生存矛盾具有巨大潜力。伦理学家则侧重于对转基因食品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的分析与评价。而对于生态学家和环境学家来说,转基因技术与杂交技术不同,它完全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和生物进化的规律,使人、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基因可以进行人为的转移,这就会改变物种之间的原有关系,破坏生物的多样性、自然的完整性与统一性,破坏生态环境。

(2) 科学家的精神气质。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家往往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气质,这使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比较注重科学证据。但是,由于对任何科学研究的评价必定带有一定的预测性而无法保证,因此,自然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在现代社会,进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经费日益增长,为了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获得资助以促进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作为直接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的自然科学家必须强调自身研究的重要性,强调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即更多的对转基因食品做出积极评价。另一方面,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可能带来的危害在短期内难以显现,由于缺乏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长远影响是无害的,他们对过分夸大转基因食品的重要性的安全性感到不安。这

也是为什么许多直接从事转基因食品研究的科学家一方面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往往并不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原因。

### 2. 影响普通公众评价的因素。

普通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评价)最为重要。影响普通公众对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是影响普通公众对转基因食品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尤为突出的表现在各国公众对待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巨大差异上。美国是多个国家人民后裔的大融合,美国人在文化上追求开放、崇尚冒险、敢于创新、易于接受新事物。因此,对于转基因食品美国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现在,美国有4000多种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销售,占美国食品总数的60%以上。欧盟人在思想上较为保守,有时遇到新事物会裹足不前,没有美国人思想开放,同时他们受基督教影响较深,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干预自然”、“扮演上帝”,是非自然的食品。因此,转基因食品受到欧盟各国人民的普遍排斥。佛教文化具有崇尚自然、反对人类干预自然的传统,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许多印度人都信奉佛教,佛教教徒一般都是素食主义者,不吃荤。因此,印度人对于转基因的拒绝非常强烈,尤其是信奉佛教的公众,经常用游行示威、毁坏农田中的转基因作物的方法来抵制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文化传统和闭关自守、因循守旧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导致中国人对转基因食品这样的新事物接受较慢,了解甚少。

(2) 新闻媒体报道。对某一事物的评价依赖于对它的认知与了解,这就必须首先掌握充分的信息。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由于其专业知识的欠缺,他们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评价可能较多地受新闻媒体报道的影响,包括新闻媒体对一部分专业科学杂志所刊登的科学论文、研究报告的结论的报道。据相关调查,普通消费者获取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依靠传统媒体即电视、新闻和广播的占75.5%,依靠报刊杂志的占45.4%,依靠网络的占28.2%。<sup>[5] (40-41)</sup>新闻媒体所报道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正负面信息往往会对普通公众的评价产生显著影响。如“普斯陶伊”(Pusztiai)事件的报道和披露曾经一度引起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慌。“普斯陶伊”事件是指1998年秋,苏格兰研究所 Arpad Pusztiai 教授在电视上宣布,他用转基因马铃薯饲养大鼠后,引起大鼠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免疫系统受损)。还有康奈尔大学的“斑蝶”实验以及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的报道,表明转基因作物有可能对非目标生物造成伤害,破坏生物多样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

(3) 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主要是通过影响普通公众的社会情感进而影响其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现代科幻小说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对未来技术的发展与研究的描述与预测,而是未来技术的运用,通过对小说中主人公的描写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行为及其变化是如何受技术影响的。根据它们所表达的对技术的一种积极乐观或消极悲观态度,科幻小说基本上分为两类:乌托邦型和敌托邦型。乌托邦型赞美技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敌托邦型警告人们注意技术对社会和人类的消极影响。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幻小说会引起人们对某项技术做出不同的情绪反应。自20世纪以来,敌托邦型一直占

主导地位。这类科幻小说并不是传递一种简单的道德信息或直接提出关于技术的道德问题,而是将读者带入一个个具体的道德两难情景和争论之中,让读者自己做出对技术的积极判断或消极判断,并最终激发读者对技术的一种敌托邦主义。这种类型的小说使许多读者一开始从情感上就厌恶转基因技术,从而对转基因食品持否定评价。这类小说的一个典型代表是雪莱夫人所写的《弗兰肯斯坦》,它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国家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 3. 影响政府决策者评价的因素。

对于政府决策者来说,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要注意多方面的利益诉求。

(1) 国家利益。在转基因食品方面,国家利益主要包括粮食供给保障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粮食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是它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以非洲国家为代表,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比较宽容。而对于发达国家和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他们的首要目标。<sup>[6] (45-49)</sup>这些国家在转基因技术水平上的差异及其产业规模的不平衡,决定了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不同。如美国的转基因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通过大力推广转基因技术的运用,大规模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和加工生产转基因食品,能够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垄断世界市场,获得巨额利润。因此,美国对转基因食品大力支持。而欧盟国家之所以对转基因技术及其食品持反对态度,主要是因为欧盟在转基因技术水平上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方面与美国存在差距。为了防止美国的转基因食品与种子出口到欧盟各国从而垄断欧盟的市场,欧盟各国就通过“转基因食品不安全”这一挡箭牌来保护欧盟各国的利益,同时利用有限时间来发展自己的转基因技术与食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2) 国民的态度。国民的态度反映了一国人民的真实利益与需要。美国人本身追求开放,敢于创新,易于接受新事物。美国70%的公众支持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因此,总的说来,美国政府认为,转基因食品并未给农产品的天然品质带来根本的改变,转基因食品只要符合“实质等同性原则”就应该是安全的。而在欧盟国家,由于受基督教影响较深,欧盟各国民众普遍认为转基因食品是非自然而对其持排斥态度。同时,欧洲的疯牛病,“二恶英”事件、“毒鸡”事件,搅得欧洲人民人心惶惶,欧洲各国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对转基因技术与食品的安全性表示忧虑,因此对其态度也非常谨慎。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摇摆不定,一方面是因为转基因食品可以提高产量、改善营养,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但另一方面转基因食品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可能的潜在危险,发展中国家对其安全性问题表示忧虑。当然,一旦决策者决定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大规模研究,他们就要对之进行辩护,更多地强调其积极影响。

总之,政府决策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依赖于各国公众、各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状况。

### 三、启示与思考

以上分析表明,社会评价主体及其评价运行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对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复杂性。不同的评价主体总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来对转基因食品做出自己的

评价。从国家到个人,从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到转基因食品的开发、应用和产业化,利益相关者在各个环节都人为地设定了某种价值倾向,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与利益,各种不同的因素影响着不同主体,从而导致了转基因食品的不同评价。

尽管如此,不同的评价主体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并非完全是以评价者及其所属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价值观、兴趣和好恶为转移。这种不同主体之间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同甚至根本相反以至相互冲突的社会评价,在某种意义上都各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来自于各种评价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方面,由于各评价主体共处于同一个社会大系统之中,并且存在社会角色的多重性与转换,这导致了不同评价之间的相互影响。普通公众的评价影响着政府决策者的评价,政府决策者的评价又主导着专家学者和各研究机构。同时,专家学者的评价又影响着普通公众,并反过来影响政府决策者。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人,不同的人的现实或潜在利益之间存在着交叉部分,那就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任何人都处于整个社会大系统之中,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若仅为一己之利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最终仍然会损害到自身利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一共同目的有效地遏制和克服乃至避免了各评价主体评价时的主观随意性和虚妄性,使得各种评价之间能够相互协调、相容共存,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借鉴、移植以丰富完善自身,从而趋向于更加的合理。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社会评价的合理性不是由合理与不合理这非此即彼的两极来加以标示的”,不同评价之间的差别常常不是绝对合理的差别,而是合理度的差别。<sup>[7] (102-107)</sup>因此,要形成对转基因食品合理而一致的社会评价,并不是要消灭不同主体之间对转基因食品评价的争论与差别,而是提高社会评价的合理度。要提高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合理度,利益和价值多元的不同评价主体之间要相互沟通,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达成共识,创造一种对彼此都有利的评价标准与原则,通过反思和商讨来发现化解利益冲突的方法,提供可能的协调性替代方案,从而最终形成关于转基因食品合理而一致的社会评价。

### 参考文献:

- [1] 靳安广. 社会评价探析[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1).
- [2] 毛新志, 张利平. 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主体结构系统探析[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
- [3] 曹建华. 社会价值评价论析[J].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05, (2).
- [4] 毛新志. 转基因食品的伦理审视[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 [5] 刘玲玲.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及潜在态度初探[J]. 农业展望, 2010, (8).
- [6] 胡品洁, 杨昌举. 转基因食品政策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J]. 南方经济, 2002, (2).
- [7] 叶泽雄. 论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的科学化途径[J]. 学海, 2001, (2).

责任编辑 周刚